

综述南方局领导的抗日战争文化运动

唐振君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摘要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次伟大的民族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这标志着全国全面抗战的开始。随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被迫从武汉迁至重庆。重庆一跃成为战时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被誉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这一时期,北方和沿海的文艺团体、文化名人都纷纷迁移至此。重庆又成为著名文化人的聚居地,然而这里到处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所把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这里并非是文化人创作、生活的“乐土”。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组建成立,从此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在南方局领导下组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团结一致,为抗日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保证了国统区文化工作遵循着共产党所指引的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关键词 南方局领导 抗日战争 文化运动

1 文化团体相继在国统区组建成立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战时的大后方,当时这里人文荟萃,著名文化人为国统区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抗战爆发,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邪恶与正义唤起大批进步的文化人迅速走上与抗战相结合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投身于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中,从而促进了许多进步文化团体的成立。

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在武汉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剧协”),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简称“影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这些进步团体在宣传抗战的同时,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随着战时的变化与推进,这些文化团体随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其中,“剧协”在重庆成立分会,“文协”抵达重庆后,立即开展总会会务活动。

战时的重庆,随文化团体的迁入,文化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步文化组织的“文协”。在抗战8年中,它在南方局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自始至终遵循:“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利益为宗旨”的原则,成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为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化、文艺事业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2 抗日战争文化运动背景

2.1 国民政府阉割文化团体阻碍抗日文化运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方针政策,不仅以重兵压境破坏民众抗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取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阻碍中国共产党宣传发动民众抗日运动。

1938年,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日,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1938年4月至1939年期间,第三厅荟萃了文化界精英300多人。“第三厅”实际上是团结著名进步文化人士一致抗日的堡垒,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爱国的有识之士,“以笔杆子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曾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而以抗战周年发动的“七七”献金运动最为著名。“献金运动”是由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拟定的以献金为主要内容的“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方案,并在武汉演绎了一次震惊海内外的献金壮举。这一场民众的献金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它不仅体现了千百万民众在国难的危急关头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和伟大的奉献精神,而且也展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空前团结。

文工会在南方局领导下不仅成为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基地,而且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的方式来广泛联系群众,营造健康的舆论,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而郭沫若则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化人代表人之一,正如周恩来曾评价说:郭沫若无愧于“五四”运动中长大的一代,“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燃烧着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1)1945年2月22日,在南方局领导下,文工会投入了为争取民主、自由的签名运动,三百多文化人士在《文化界时局进言》在签名。此次签名运动不仅令舆论界震动,更令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严查。1945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街七号召集会议,宣布文工会工作到此结束。

2.2 国民党对国统区抗战文化工作进行严厉的限制

武汉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转移主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时,国统区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抗战文化运动遭受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三重压迫。

在政治上,国民党炮制一系列高压政策对文化人进行迫害。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加紧进行政治压迫,而且还加强了文化统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下,广大文化人没有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难以忍受这种精神折磨。

在经济上,国民党对文化人进行压制。在国统区物价飞涨,广大文艺工作者难以维持温饱。国民政府对抗战文化活动

滥施各种苛捐杂税，阻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单戏剧演出，就要缴纳娱乐税、印花税、救济捐、演出税、寒衣捐等等。这些苛捐杂税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经济窘迫，生活日艰，处于贫病交迫境地，有的贫困致死。叶紫病逝时，连入殓的钱也没有；王鲁彦病故时，连买件衣衫的钱也没有。这些事例都说明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进步文化人的罪行。

在文化上，国民党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在国统区，国民党大肆压制和扼杀进步文化，下令大量查禁书刊、剧作等进行文化限制，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1944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审查剧本目录，不准上演者一百六十种，须修改后始准上演者七种。禁演剧本中有《草莽英雄》、《风雪夜归人》、《秋》、《原野》、《石达开》等。

3 南方局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

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为加强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南方局专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它主要负责领导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至“文委”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以中共中央的统战思想为指导，从重庆及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方针政策，紧紧依靠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广泛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开展了蓬勃深入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示说：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2）应动员与联合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各部门的文化人与青年学生共同投入这一运动。关于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南方局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研究和部署，并决定由周恩来、凯丰负责文委工作。在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共同推进。

南方局领导文化界开展的签名运动。围绕解散文工会，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文工会从郭沫若起所有领导干部都投入了以秘密方式发起的签名运动。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名发表由郭沫若起草的《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1945年3月11日，昆明文化界300余人签名的《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之后，1945年4月11日，成都文化界121人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统治、尽快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普选的国民大会、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10项主张。

在南方局领导下，重庆“雾季戏剧节”获得演出成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国统区到处都是军警、特务、宪兵肆意屠杀中共党员，逮捕左翼文化人士，政治部文委会被特务盯梢，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文

艺界的活动极少，戏剧界因环境及剧场限制难于发展。出版界因印刷和检查之限制，日益萧条。国统区政治环境恶劣，文化统治加紧，文化人被监视，出版新书亦减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南方局文委对当时的形势进行深入的研究，1941年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而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又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并因此和徐冰、阳翰笙等进行了仔细研究，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

（3）这场以戏剧作为突破口来冲破国民党沉闷的政治空气的抗战戏剧运动就这样孕育而生。1941年秋至第二年春，因这段时间重庆多雾，故又有“雾季戏剧节”之称。在重庆发动雾季戏剧运动演出，首先筹办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并于十月起先后演出了《大地回春》和《天国春秋》，接着推动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其他一些剧团在此影响下，也相继上演了一些进步戏剧。这些抗战进步戏剧的演出，在重庆人民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映，盛况空前。沉寂的戏剧舞台活跃起来，文艺创作随之发展，许多好的作品争相问世。至次年春，先后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达到了近百出。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由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的公演，轰动了山城，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将雾季戏剧演出推向高潮。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以话剧为先锋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禁锢，使国民党欲压无能，欲止无策，取得了第一个雾季大演出的胜利。在以后的三个雾季中，重庆的戏剧工作者亦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一次又一次地把国统区的戏剧运动推向前进。

“雾季公演”活动历时五年。所上演的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绝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进步的、战斗的。在发起和参加演出活动的人当中，许多是文艺界的旗手和山城剧坛璀璨的明星，如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夏衍、老舍等；参加演出的团体包括当时重庆所有的著名话剧团体；演出的剧目包括《棠棣之花》、《日出》、《天上人间》在内逾百个，其中产生的许多优秀话剧节目传诵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雾季公演”是抗战时期重庆市文艺界的一大盛事，在国难当头的时期，起到了唤起民众、鼓舞士气、团结抗战、复兴中华的作用。

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是处在侵略者的铁蹄和凌辱，伪政权的高压和限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的，虽然迂回曲折，但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不仅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限制，而且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的文化统制，在此伏彼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方局党史资料 大事记》，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一版，第178页。

[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2月第一版，第477页。

[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2月第一版，第527页。